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

王 宁

内容摘要 经典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在“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下，中国文学的不少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文化研究虽然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长期以来一直未能突破“英语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仍处于“边缘”地位。针对当前文学批评的“泛文化”现象和研究疆界的无限制扩大，应提出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之策略，这是使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得以沟通和交流进而共存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经典重构 文化批评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者 王宁，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100084）

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全球化已经引发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因此讨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必须面对和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把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察，并且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及对话

既然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生产及研究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那么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和文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过去被精英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不齿的“亚文化”产品或大众文化产品统统跻身文学的殿堂，甚至产生于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文学也堂而皇之地与纸介文学出版物争夺市场，并大有取代后者的势头。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泛文化”的趋向：一方面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文学研究能否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下去也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研究范围的无限制扩大，大量的“亚文化”或“边缘文化”研究课题进入文学研究的领地，致使文学研究疆界日益模糊，并大



焦红心 摄

有被文化研究吞没的趋势。这样一来，两种文化的对立状态便再次出现。面对这一状况，同时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应抱何种态度？这是我们要正视从而消解这一人为对立的一个出发点。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文化研究”之含义。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不同，当今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一个舶来品，来自英语学术界，它并非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艺术，而恰恰是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

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等几个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的考察分析。因为始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建基于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之上，并逐步扩展到对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研究，而且许多在当今十分活跃的文化研究学者，本来就是某个领域内卓有成就的文学研究者，这种情况在中国更是突出，可以说，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推进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取决于文学研究者的努力。因而我们不妨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学文类和跨文化等级的多元视角出发，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其次，我们要对当今风行的各种大众文化现象作出冷静的思考和学理的分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中国也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话语力量处于一种共存和互补的态势：有些学者仍在探讨文化理论本身及其价值取向，旨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频繁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使中国学者得以登上国际论坛与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进行直接的对话；高雅文化产品的生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运作，而相比之下，先锋派的探索精神则日益衰落；消费文化的崛起对传统的精英文化生产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是也吸引了部分精英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力。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目前不少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消费文化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其对既定的经典文化及其产品——文学艺术的消解力量。网络写作的普及使得一亿多网民活跃在赛博世界，他们充满热情的写作、交流和发表有力地削弱了传统的写作方式；芙蓉姐姐在青年学子中的走红消解了传统的青春偶像；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写、甚至在电视和通俗图书市场上传播则无情地对既定的经典进行了重构；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读、易中天对《三国》的通俗式重构以及于丹对《论语》的研究心得等，无疑都削弱了这些领域内的权威学者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剥去了“经典只能由少数专家解读”的神话。对“超级女声”的大肆炒作自然也影响了人们对高雅音乐的传统审美标准，使得被压抑的音乐想象力得到极大的释放；一些装帧精美但内容空洞的杂志的广为流行，使得精英文学和学术期刊被大大地边缘化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群，他们中一些人需要“审美地”享受生活和消费文化。既然他们无法仅仅满足于物质享受，就必然以一种艺术的和审美的方式来消费文化商品。繁忙的一天工作之后，他们需要放松自己，因而宁愿坐在电视机前享受轻松的艺术表演，或通过“家庭影院”来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而无须去电

影院买票。他们宁愿阅读一些与自己的生活十分贴近的短小纪实作品，而不愿坐在书桌旁阅读厚厚的长篇经典小说。这样看来，高雅的文化产品成了可供他们消费的商品，而非以往我们所认为的精神食粮。面对这一情形，那些同时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学者将有何对策？难道我们只能居高临下地像过去那样对通俗文化生产者、消费者进行“启蒙”或说教吗？或者说，我们倒不如置身其中，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考察研究而实现某种“后启蒙”的作用？我认为，后一种态度也许更为可取，同时也更有助于消除全球化时代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人为对立。

再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更是使得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距离大大地缩小了。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本身也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之所以要借助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来分析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是因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则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197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代主义的引入、1980年代的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之后早已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的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和主流话语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更是占据了本来就日渐萎缩的精英文学和文化的领地。人们不得不为文学和文化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走向以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而担忧，从而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在过去的几年里，大众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的不安。我们可以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亚文学作品和影视光盘；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回自己曾在新时期有过的荣耀感和广阔活动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成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笔者作为同时从事文化研究的文学研究者，始终认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同样，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欣赏文学，文学就不会消亡。即使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学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它仍有存活的理由，它仍能够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曾经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文学热”和

“文化热”恐怕再也不会重现了。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认识，这样我们就在纷繁复杂的变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滥觞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特征的普遍现象。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和文学创作再度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新结构和重新组合，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等等。这一切均发生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理论思潮和后现代条件给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机会，他们完全有理由从原先从事的写作和研究领域转身进入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指向的“公共空间”去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东方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涛和新世纪伊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遍文化品味的下降，使得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担心：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未来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前途？我认为这样的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大可不必为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对立推波助澜；从一个灵活的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消解这种人为的对立，倒是更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经典的形成与重构面临的挑战

“经典”自进入英语世界以来一直有着宗教和文化上的双重含义，而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中所讨论的经典则主要是指文学的经典。本文所讨论的主要也是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已经作过许多界定和论述，笔者也曾发表了不少文字。在这里，我仍想强调指出，就其文学意义而言，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首先便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仅在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其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接受美学的挑战，其次是新历史主义的挑战。接受美学的挑战不仅之于文学史的编写，同时也对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模式予以了刷新。在接受美学的挑战面前，比较文学的单一的“影响研究”逐步过渡到双向的“接受与影响研究”：既强调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影

响，更强调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接受。而新历史主义的挑战则为文学经典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作为这一挑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学经典的重构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欧美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讨论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的问题甚至成为一种时髦的话题，同时也主导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的讲坛。近年来，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经典的内涵及构成因素，但远没有上升到国际性的关于经典的形成与重构的理论讨论之层次。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学术界围绕经典的构成和重构问题展开的理论讨论进行简略的回顾。

首先是比较文学界对经典的关注。由于比较文学首先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的比较研究，有时甚至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的比较研究，因而比较文学研究者对经典问题自然十分敏感和关注，他们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对于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构经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围内发展的，但在80年代后期，经过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劲的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也发生了变化，它逐步引入一些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课题，并有意识地对经典文学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经典进行重构。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坚持传统立场的欧美比较文学学者的观点值得一提。

一位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流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在他看来，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对经典构成的这种历史性和人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

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两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对于后者，我们也不可忽视，有时这后一种因素也能对前一种因素作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

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 (Douwe Fokkema)。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霸主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可以这样重新理解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佛克马和蚁布思 (E.Ibsch) 在一本近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其中大量引证中国文学的例子，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1]。佛克马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化”摇旗呐喊，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从自己所涉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选取素材，甚至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腹地有力地冲击了这种顽固的思维模式。

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的贡献主要体现于消解了文学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之神化，为文学史学的多元方向铺平了道路。此外，新历史主义也揭示了经典构成之背后的强势话语的主宰作用和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为一些长期被排斥在正统文学史和经典之外的“边缘”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和经典的行列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界，对既定的经典的质疑和对文学史的重写之尝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体现于当今对文学经典的重读和“漫画式”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原则中找到理论

的依据。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话语力量就是文化研究，它对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作出了最为激进的实践和尝试。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 (decanonization)。一方面，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来挑战经典的地位。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产生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但文化研究招来的非议也是颇多的，上述两位学者就是其反对者或怀疑者：布鲁姆随时都不忘记抨击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而佛克马则主张用一种更带有科学意义的“文化科学” (cultural science) 来取代文化研究。但更多的一批早先的文学研究者则主张，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把文学研究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步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加以考察，这也许有助于摆脱目前的文学研究遭遇到的“危机”之境遇。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经典的形成与重构问题，就无法回避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化”地位。实际上，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的传统，或者说已经成为了另一种“现代”经典：它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现代文学进行对话。它应该成为西方汉学家研究现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因此，随着全球化时代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地位必将发生改变。这样看来，我们对于既定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为经过关于经典的形成与重构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种相对的共识：文学经典的确立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的“经典”有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在今天变成非经典；昨天的被压抑的“非主流”文学（后殖民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等）也许在今天的批评氛围中，被卓有见识的理论批评家“重新发现”而跻身经典的行列。但是究竟从何种角度来确立经典进而重写文学史，则是我们首先应当确定的。过去，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笼罩下，西方的汉学界长期以来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中国古代文学几乎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且有着与西方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传统，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堪称另一种形式的“东方经典”；而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甚至是一种“西化”的汉语文学，因而其经

典地位令人怀疑。我认为除去这些学者政治上的偏见外，另一局限就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缺少最基本的理论训练和素质。今天的中国学者在讨论经典时，不仅要过去被长期压抑的“潜在的”经典发掘出来，更要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为提升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地位有所作为。

在整个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日益走向现代性进而走向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日益具有了一种整体的意识，并有了与世界先进文化及其产物——文学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一方面，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并非消极被动的，而是更带有中国作家（以及翻译家）的主观接受——能动阐释的意识。通过翻译家的中介和作家本人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影响已经被“归划”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既带有西方影响同时更带有本土特色的新的文学语言。虽然它所使用的语言带有明显的“欧化”或“西化”痕迹，所使用的艺术技巧也大多为西方同行所使用过，但是它所描写的内容或所讲述的故事却是地地道道发生在中国的民族土壤里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在与世界先进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对外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可惜的是，这一事实尚未引起西方汉学家的足够重视，也大多没有能被列入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课题。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汉语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推广，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会越来越重视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美学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因此可以预见，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之下，文学翻译的重点将发生转变：致力于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到世界，让全世界的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共同分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方面，五四新文学的先行者所走过的扎实的一步至少是不可缺少的和可供我们借鉴的。但是从今天全球化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文化翻译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大量地把国外，尤其是西方文化理论思潮和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同时，却很少借助于翻译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文化成果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我想这无疑是个时期他们的一个历史局限，而这一历史局限应当由我们这一代学人来克服和超越。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问题，一定要对前人和西方汉学界有所超越：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之下考察，通过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模式”的经典体系，来实现中国文学的“非边缘化”和“重返中心”之策略。

走向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

对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泛文化倾

向”，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都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非议。他们担心总有一天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大潮会把已经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地全然吞没。尽管目前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但这种警觉也不无道理，它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认识到，如果一味强调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而忽视具有审美特征的精英文学研究，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么，文化研究是否天然就与文学研究有着对立的关系？能否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二者究竟有没有共同点？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不应当全然对立。如果着眼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早已有相当一批著述甚丰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并引进文化研究的一些有意义的课题。在近十多年内出版的《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各卷，编者都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文章从不同的跨文化和跨学科角度来讨论文学史上的老问题或当代文学现状，从而推进了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形成。他们认为，研究文学不可忽视文化的因素，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也即过分强调它的艺术形式的话，也会忽视对文化现象的展示。因此，他们便提出一种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方向，也就是把文学的文本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阐释最终达到某种文学的超越，这就是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它不仅能够活跃当代的研究氛围，同时也能起到对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的作用。应该指出，正是在经典的形成和重构的讨论中，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了可以进行对话的共同基点。既然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跨文化的阐释和研究之境地，那么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来质疑既定的“经典”，并重新建构新的“经典”就应当是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新的任务。针对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中的“泛文化”倾向，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之设想，以实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之间的对话和沟通。

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古代的点评、近现代的直觉印象式批评和当代的作家作品意义的“附庸式”注解和文本叙事形式分析等阶段，现在应该进入文学的文化批评之境地了，因此将蕴含着深刻意识形态内容和丰富审美精神的文学作品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无疑是使我们走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之二元对立的必然之路，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走出国门，进入跨文化的批评和国际性的理

论争鸣。就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而言，我们通过对历史上文学经典的形成的考察，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任何经典文化和经典文学在一开始都是非经典的，诸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复活》、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样的传世之作，一开始问世时也不是经典。甚至还有学者对莎士比亚的著作权提出过质疑，因而导致莎学界的一桩公案持续了多年。经过历史的考验和文学研究的发展，今天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哈姆雷特》等优秀剧作是不是莎士比亚写的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产品，也就是成为我们广大读者和欣赏者鉴赏的经典文学作品，它们对我们产生了启蒙和启迪作用，对我们的生活认知和审美情趣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们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而对于另一些一开始属于流行的通俗文化产品，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批评家的阐释，这些作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精英文化产品，进而进入经典的行列，目前的网络文学中的一些佳作就有这种可能。如此看来，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并非要形成这种对立，而是应该进行整合，这种整合有可能会促使文学批评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也可能把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领域逐步扩大，使它再度出现新的生机。我提出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文学批评（文化）语境化，文化批评（文学）审美化，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批评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它不仅指向文字文本，同时也指向视觉文化文本和各种图像。在这方面，我认为理论的阐释始终有着广阔的空间，但是这种阐释不应当只局限于精英文学文本，它也可以指向视觉文化文本和大众文学文本。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批评的路径也不只是单向的从西方到东方，而应是双向的。即使我们使用的理论大多来自西方，但通过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性阐释，这种理论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形，成了一种不东不西的“混杂品”。

我认为，这正是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所谓“纯真的”理论或文学作品是不可能出现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的经典在发生裂变，它已容纳了一些边缘话语力量和一度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通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其中的一些糟粕必然被淘汰，而其中的优秀者则将成为新的经典。

注释：

关于笔者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参阅拙著《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尤其是中编“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中的章节。

实际上，在西方文学理论界，不仅是《新文学史》这样的权威刊物组织编辑过讨论文学经典问题的专辑，另一权威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也组织类似的

专题研究和专辑。由于这两个刊物对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导向”作用，关于经典形成及重构问题的讨论在英语世界至今仍是一个前沿理论课题。

参阅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17.

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性的定义及其作用，Cf. 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5: 200.

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之现状，参阅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

参阅最近的一期《新文学史》，主题是“当今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 Now?）. Vol. 38（Winter 2007），No. 1.

参考文献：

[1] Douwe Fokkema & Elrud Ibsch, *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40

编辑 叶祝弟

